

## 一九九四年 八十四岁

一月十一至十七日，以邵逸夫爵士杰出学人身份访问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并作《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的学术演讲。一月二十五日的香港《今晚报》有详细报道。

二月十七至三月一日，参加广州“中华文化通志”第二次作者代表大会；访问深圳，参加企业家座谈会；访问海南通什。

五月十六至二十八日，访问信阳，参加第三届茶叶节；访问安阳和濮阳，参加第九届中原经济协作会；随后访问郑州。

六月一至十一日，访问徐州，为徐州机场路剪彩，访问苏州工业园、吴县、吴江，并接受东方电视台采访；随后返南京，参加民盟华北片盟务座谈会。

七月九至十六日，到北戴河休养。

七月十九至二十九日，访问山西太原、五台山、代县和大同。

八月二十八至九月四日，访问菲律宾，接受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该奖于八月三十一日由菲律宾总统拉莫斯颁发；九月一日在菲律宾马克赛赛社区领袖奖颁奖会后发表《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演讲。

九月十至十四日，访问河北省广宗县、青州市、藁城市、石家庄。

九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专访《为接朝霞顾夕阳——访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

九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专访《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费孝通》。

九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访问山东滨州市，参加黄河三角洲滨州跨世纪战略研讨会。

十月四至二十日，访问江苏扬中县，参加扬中撤县建市和大桥通车典



礼；访问无锡市、无锡县前洲镇西塘村；访问江阴市金三角、三毛集团；访问张家港市、吴江市庙港镇开弦弓村；考察吴县太湖大桥；访问苏州市；访问安徽蚌埠市，参加第九届淮海经济协作区会议；访问凤阳县小岗村；考察阜阳地区蒙城县牛交易市场。十一月四至二十九日，访问河北、江苏、福建、江西和浙江。其中，五日参加河北沧州跨世纪研讨会；十日在江苏南京参加“小城镇，大问题”发表10周年座谈会；随后在福建福州参加中华职教社成立10周年会；考察莆田、福清、长乐县；考察江西鹰潭、浙江杭州和温州。

### 著作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这是十一月十日在江苏南京参加“小城镇，大问题”发表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信阳行》，载《瞭望》1994年第35、36期。文中道：“今年5月我应信阳地区之约去参加他们茶叶节的庆祝大会。我很愿意也很高兴。因为我自己规定今年的科研课题是怎样发展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很想了解一下中部地区走什么路子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信阳处于豫鄂边界，和其它大部分中部地区一样，既没有搭上80年代初发展乡镇企业这班车，90年代初又没有冲进市场经济这个浪潮，农民的人均收入多年来还是在500元这条线上徘徊，比起沿海地区差了半截。十几年来扶贫工作一直走不出怪圈，办集体性乡镇企业又缺乏经营人才，效益不佳。为了彻底脱贫致富，信阳人民认识到以农为主的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先抓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开始治水治山，修路通车，把自然环境治理好。现在，金龙山的园林经济已经成了豫南的明珠。在这基础上，信阳人又创造出‘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即农户是生产者的主体，公司是集体性的服务体系，两者加起来，既克服了个体农户分散生产的缺陷，而集体性的公司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体系把分散的小生产团结成以具有当地特点的拳头产品为支柱的社会化大生产，通过公司的协助生产，包销产品的服务体系，走出一条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分具体的路子。据统计，信阳全区兴办这一类的公司已有960多个，纳入农户达40多万家，人均年增收300多元，并且还在由点及面地推广之中。”

《焦作行》，载《瞭望》1994年第48、49期。文中道：“焦作自然条件优越，不但矿产丰富，而且历来就是农业高产地区。近年来，它的人均乡镇企业产值和人均农民纯收入都居河南省第一位。今年5月末，借列席豫鲁冀晋四省黄河北岸14个地市经济技术协调会之际访问了焦作，体会颇多。焦作的经验是‘无工不富’，农业高产地区致富还是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尽管焦作的乡镇企业80年代中期才起步，但却直接进入了市场经济，以销定产，通过农矿产品的深加工，提高附加值，走出一条以点带面，建设小康村，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道路。从92年到现在建成近1000个小康村。与信阳相比，增加‘基地’两字就是强调由点及面的意思，即许多农户和农村集合起来在统一的服务体系，也就是公司内，形成同一产业的集体，即基地。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一个区域经济带。这既符合提高农户收入的目标，又保证了用集体的收入来建设现代化农业，是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地区农村发展的一条值得选择的道路。另外，从全国一盘棋出发给焦作定位，可以把它和洛阳、郑州结合成中原金三角，作为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中心枢纽来考虑。”

《个人 群体 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文中道：“对社会的不同看法造成了理论上的不同倾向。我在清华师从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时，就已经接受了他的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想以及对于个体生物基础的关注，这使我很容易地就接受了Malinowski的‘制度手段论’的功能主义。然而后来我的研究工作，尤其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却更赞同Brown和Durkheim的关于社会是一个实体的功能论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连同我从Park教授那里学来的社会人类学方法用于我在云南内地的社区研究。这一时期是对瑶山和江村的调查的继续，所用的方法除了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之外，还汲取了史师体质人类学的分类和模式这些比较方法的精华，并在80年代我开始关注城乡社区不同发展道路时继续应用了这一方法。问题在于，我整个大半生的学术经历，一直可说是只见社会不见个人的，而文革30年的巨变经历却让我认识到‘社会尽管是超然于个人头上的力量，而个人却也可采取自觉方式抵抗这一力量’，因此，更有感于

40年代《生育制度》完稿时和潘光旦先生的一席争论。他的新人文社会观把生物人与社会相结合,认为人是本位,文化是手段。我逐渐认识到自己只注意到了社会的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故而,当前的社区研究要提高一步,除了社会结构外,还应当研究活生生的人。应从生态研究进到心态研究,并应致力于发掘中国几千年发展起来的关于人与人中和位育的经验,贡献给当今世界。”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文中道:“如果把社会学学科范围放宽些,社会学的来源在中国就有很长的历史。30年代Radcliffe-Brown就提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有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那时,受Park和Brown的影响,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实现了通家之好,名虽不同,实则无异,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特色。直至抗战,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我们注重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的‘社区研究’,Malinowski称这种研究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过去在中国搞的‘社区研究’多偏重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人群中群体生活的道义关系注重不够。中国历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群中的道义关系,中国世代积累的经验宝库里是否还保留一些值得加以发扬的内容?”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文中道:“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在解放前从来没有独立设系,而是附设在社会学系内。抗战时期的边区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50年代社会学取消之后,独立成为民族学。70年代恢复社会学以后,实质上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这三门学科的界限已很混乱。人类学本身是一个综合的体系,但在英美体系中,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已各成一科。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也是各自为政,除了芝加哥大学的Park教授吸取了人类学的方法在搞‘社区研究’。Park和Brown的讲学影响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使得中国的社会学吸取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走向‘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如何认清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呢?我一直主张学术工作主要是认定研究对象而不必在学科名称上发生无谓的争执。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但我的研究工作明显地有它的一贯性。我认为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

科,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领域的,就是Park教授所提倡的‘社区研究’。”

《人不知而不愠》,《读书》,载1994年第4期。文中道:“我的老师史禄国教授(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20年代写的《满族社会组织》一书商务馆要出中文译本,我不敢作序,只好在书后写一篇记下对这位老师的追忆。1933年暑假前,燕大的吴文藻老师为了培养中国社会学的人才,带我去清华师史禄国学人类学,用人类学方法来充实社区研究,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有两年时间我花在体质人类学上,原本的计划还有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培训,后来因故中断了。35年之后直至他去世,我们一直没能再见。史氏享年五十有余[1887(90?)—1939]。他出生于帝俄末期的世家,深受彼得大帝传下来的向西欧开放和向东亚扩张的基本传统影响,二十岁时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接受了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把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以及所创造的文化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企图用科学方法来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他和Malinowski, Brown及Krober可说是同时代的人类学巨匠,但由于他表述能力差,而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期流亡中国,一生坎坷,学术影响也小。然而他的思想和学术的精博在我看来却胜过他们。作为举世闻名的通古斯专家,他的巨著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 Psycho是他的一生研究计划的代表:从人体的生物基础,到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并把这些现象当作一个复杂而融洽的整体看待。同时,他的‘Ethnos’理论从最广义的意义上说明了种群的生物和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可以作如下概括:即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这样一以贯之地把人之所以为人全部放入自然现象之中,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符其实的人类学。”

《从蚌龙想起》,载《读书》1994年第9期。“在河南濮阳参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M45号墓时,又想起我的老师史禄国关于通古斯人曾在我国中原地区定居过的设想,只是墓主的身高184厘米远远超过史氏推定的162厘米和159厘米的通古斯人平均身高(其头型现场看



不出来)。六年前出土的墓室，当时轰动一时的并不是骨架，而是在墓主骨骼两旁用蚌壳排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在墓主脚下略左，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个胫骨。据考证，墓主很可能是个巫师，但是这条蚌龙却又在我思考的范围内撒下了不少的疑点：六千年前住在我国中原地区的人是否有一部分北迁，远及西伯利亚，他们的后人被称作通古斯人，后来其中一部分又自称满人回到关内？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仰观天象，注视太空的星宿，用来区别空间的四方和时间的四季，产生了青龙、白虎等“四宫”的概念？在追求克服空间距离时又产生了以乘龙、乘虎和乘鹿的三断观念，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道家思想的底子？把鹿和龙、虎并提，又是否表明当时中原居民已经把鹿驯养成了家畜，又和鹿结为生活伴侣，成为衣食住行的供应者，一直在通古斯人（如鄂伦春人）中保存下来？（后来考古所的潘其凤同志修正了主人告诉我的墓主身高184厘米的结论，认定其仅有170—172厘米，而头骨问题仍未有结果。我自认为这篇杂文可把自己考虑问题的思想过程暴露出来，为年轻朋友们开介一下老学者思考问题的脉络，可能会有好处。）”

《芳草天涯》，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这是一本杂文集。包括了《留英记》、《初访美国》（8篇）、《重访英伦》（6篇）、《美国人的性格》（8篇）、《访美掠影》（9篇）、《访澳杂记》（5篇）、《英伦杂感》、《访日漫笔》（5篇）和《英伦曲》。

## 一九九五年 八十五岁

三月一日，《中国图片报》发表专访《一抹夕阳漫天霞——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

三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考察扬中、镇江龙山鳊联、无锡。在无锡参加乡镇企业家委员会年会，考察无锡县王祁镇黄泥巴村。

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考察上海浦东。

四月二至十九日，考察广州丰花织带厂、南海市海天集团、东莞市宝联制衣有限公司、华凯手袋厂、东莞清溪镇、深圳华琛运输公司、超顺集团、深圳大学、中山市鳊鱼养殖场、阳江市。

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考察河南漯河市南街村、新密市袁庄乡、项

城县。

五月十至二十二日，访问苏州，并参加全国人大科教文卫研讨会，参观吴县工业园，访问吴江市，并在吴江写成《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五月三十至六月四日，访问石家庄，并参加民盟帮扶广宗县脱贫现场会，参观郊区城建开发公司，考察无极县。

六月八至十三日，考察贵州毕节地区。

六月十五至十七日，考察天津市、廊坊市。

七月十五至二十六日，考察内蒙古赤峰市，参观太平地、宁城酒厂、巴林右旗。

七月二十九至八月十四日，考察辽宁省和黑龙江省。

九月一至十三日，考察甘肃定西地区、临夏回族自治区和白银市。

九月十六至十月一日，参加吴江市经贸洽谈会、民盟参政议政经验交流会，考察扬州市、镇江市和南京师范大学。

十一月一至十一日，参加统战部组织的苏南、浦东考察，考察地区包括张家港、吴县市、吴江市、昆山市、常熟市、浦东。

十一月十五至十二月二日，访问湖北省武汉市，参加全国人大科教文卫检查教育法落实情况；访问福建南平市，参加四省九方经济协作会，检查福建教育法落实情况，访问浙江金华（途经江西鹰潭），参观义乌小商品市场；访问云南（途经上海），参加一二一纪念活动。《闽北日报》二十三日发表专访《希望你们都富起来——南平市西芹村随记》。

### 著作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文中道：“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是从农村调查开始的，其后进入小城镇研究，近年来又开始区域发展的探索，统称为一生社区研究的历程”。“我在农村实地调查里从亲眼所见的事实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1982年以后，我的社区研究领域比30、40年代已经扩大。首先是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

提高了一个层次，把小城镇看成是城乡结合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研究的地域也从家乡的一个村扩大到吴江7大镇，又到整个吴江县，再扩大到苏南地区。到1984年，我走出苏南，进入苏北，对苏南苏北进行了比较研究。很明显，我这一时期研究地域的扩大有意无意地是顺着行政区域的层次进行的”。“模式这个概念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我所提出的不同发展模式”。“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要说明它们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具备了这种知识，各地农民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生财之道，争取早日脱贫致富”。“经济上的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点，具有相同地理条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在竟发展上具有一定共同性的经济区域”。

《家底实创新业——再访温州》，《瞭望》1995年12、13期。文中道：“1986年初春我来到温州访问，当时是听说有个和苏南模式不一样的温州模式以后慕名而来的，想探求两者之间的不同特点。那时候的温州已经在计划经济之外有了一个民间的，在小商品市场基础上起步的市场经济。这个以商带工的模式，形成了大量的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但其不利的一面则是盲目性、规模小、技术低且质量不高。当时我就认为温州模式应该有一个不断提高和完善的过程。八年后再访温州，‘走向联合’的预想已经成为现实了，即通过走‘股份合作’的道路，把过去分散在各户的资金、劳力、场地、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愿组合起来，在县、乡镇各级政府支持下，实现资金和劳动经营的双重联合，创造出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点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不依靠国家投资，凭借个体经济的原始积累，发展了生产力，并且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安华光经编厂对股份合作企业经营思想的创造性发挥，走出了一条源于传统、富有东方色彩的适合中国农民意识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我称之为‘经济结义’。温州模式另外两方面的新发展是：第一，在剩余劳动力单向外流的同时，也吸收



了外地大量剩余劳动力，即‘出去一百万，进来五十万’。第二，即是在专业市场的推动下，农民依靠自己的资金和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走上城乡一体化的进程。15年来的积累，已经使温州成为一个民间殷实的地区，可用资本达160亿元。目前，温州正在进行以‘经济发展从外延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化，市场取向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农村城镇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人民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为目标的第二次创业。这不正是家底实后的创新创业吗？”

《豫中行》，载《瞭望》1995年26、27期。文中道：“今春‘两会’期间，我从河南来的人大代表那里听说漯河正在搞“富民工程”。实施时间不长，已经初见成效。全市农民人均收入一年内增加387元，增幅为52.6%。豫南的信阳和豫北的焦作我已经去过，现在再加上漯河，不就可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原地区的致富之路了吗？访问漯河的第一站是郾城县黑龙潭乡半截塔村。这个村通过上养殖项目一年致富的实例给我许多启发。家庭作为生产经营的单位，是农村经济的细胞。‘富民工程’从家庭起步，既符合农村的实际，又符合农民的心理。从家庭组织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来看城乡发展，实际上是它已经成为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出发点。‘富民工程’起步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却从传统中走出创新来。舞阳县的‘农户上项目认定标准’隐含的正是现代经济所追求的集中、流通、规模、信息和效率。另一个创新则是‘微型庄园’，把农户的宅基地和责任田合在一处，使专业化商品生产和生活合为一体。各家各户的专业化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出现专业村、专业乡镇甚至专业区域，促进专业市场的发育和成型，并接着带动运输、加工、商业服务业和中介组织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加快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此，从当地资源出发搞一条龙的产业（典型的如临颖县南街村的食物工业），从农业中长出工业来，似乎是中原地区致富的普遍之路，不但民权如此，信阳、焦作也是一样，起点是农户，特点是专业生产，趋势是兴办高附加值的工业。我想，只要中原这块腹地活起来之后，东部地区长远发展的根基就坚实了，同时，也为中部大陆桥经济走廊奠定了实力。”



《三访赤峰》，载《瞭望》1995年39、40期。文中道：“1984年初访赤峰时，我已经得知，现在这块生态破坏严重、土地日益沙化的地方在夏商时代却是属红山文化的农业区，即使到了一千多年前的辽代，也还是辽国上京和中京的所在地。解放后赤峰就开始着手治沙，我在《赤峰篇》一文中叙述了太平地乡的林网建设，其实还有其它各地的许多经验。长期以来，赤峰地区的问题在于表现为民族矛盾的农牧矛盾。初级水平的农业和牧业相互争夺土地资源：广种薄收的农业在地力消耗时就换一块地再重复这种方式，抛荒的地很快沙化。与此同时，用于牧业的草场面积缩小，而牲畜存栏数增加，造成草场超载，草原退化。如何处理好这一地区的农牧关系，成了赤峰这样的边区发展的关键。今年7月我第三次访问赤峰。赤峰的经济已有所发展，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6.5亿元，比1983年增加5倍多，而且工业产值已超过农牧业产值，达6:4的水平，其最主要的经验也是搞农牧结合，‘引农入牧’，或者‘引牧入农’。最典型的就是巴林右旗大板镇搞的‘小草库伦’，其实是牧区的庭院经济：库伦中间是牧民的住所和畜养牲口的圈栏，周围是种玉米的饲料田。夏秋公共草场有草时放牲口出去，草不够了就回到库伦靠精饲料喂养，走放牧和舍饲相结合的道路。这次在赤峰，重点还探讨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得出了几个看法。一个是赤峰乡镇企业起步晚，却可免走弯路，直接重视市场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赤峰郊区和元宝山矿区正在发展的小型制造业已经以市场为导向，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三就地’形式。其次在于资金方面，应该学习中原地区以庭院经济为基础使千家万户富起来，通过‘农户+公司+基地’的模式最终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小草库伦’已经开了个头，但还没有推广，其重要性还没有被认识到。另外，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赤峰，现在最急需解决的是交通问题。集通铁路只是个开头。有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就可在治理生态的基础上搞农牧结合，发展庭院经济，把整个区域内的经济细胞聚合成广大的腹地，培育出市镇和服务体系等各类中心，这样看来，赤峰将大有作为。”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和《讲课插话》，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文中道：“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开设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我讲一次关于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马师的写作习惯和他过早的辞世，使得他生前并未有理论著作出版（《文化的科学理论》（1944）、《文化变异的机制》（1945）、《自由和文明》（1947）等理论著作都是后人整理出版的）。我37年译的《文化论》原本是36年马师赠给吴文藻老师的手稿，和后来整理出版的变动很大了。故而要全面介绍马师的理论，是一件还需要从头做起的研究课题。我觉得自己虽则从马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并贯彻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之中，但我决不敢说对他的理论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我没有资格去讲他的‘文化论’，至多只能讲一点我自己的体会。首先，马师作为西方人类学新旧更替的代表人物有他自己的‘天地人’三才条件：他既有波、德、英三国高等学府的名师培养，又得到了长期实地深入现场调查的机会，同时一战后殖民主义基础的瓦解，也迫切需要和原来的以弗雷泽为代表的社会进化主义不同的理论的出现。文化功能论正好适应了时势的需要，认为不同民族在文化上有着共相。其次，人类学方法从间接资料走向第一手资料，从书斋走向现场观察的转变，也促成了文化理论的成形。指导田野工作的就是以一系列问题构成的‘参考体系’，马师称之为‘文化表格’。文化理论实际上就是观察文化实际的方法。因此，可以说这种文化论是‘朴实的’文化论。在‘文化’的定义上，马师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前人（比如Talor）的思想，但其主要观点还是和他们有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文化是人为的，所以人文世界有别于自然世界。第二，文化是生活得以运行的手段，是满足人类生活的人工体系。第三，文化既需要创造，也需要继承，还要和他人合作。第四，文化是对自然世界的加工，要有自然的物质基础。第五，人文世界是由相互联系、配合、互动的各个方面构成的体系的整体[包括物资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后来马师又把这几个方面分成三个层次的需要，即基本（生物）需要、派生（社会）需要和整合（精神）需要]。认定人基本上是个生物机体是马师固定不移的立场，而功能说则是他朴实的文化论的出发点。这样就可以理解他和Radcliffe-Brown的争论了。尽管后来（1944）马师修正了他的观点，认为‘需要’是‘群体和个体都必

须的生存条件’，确认了文化并非简单地从生物基础上直接演化而来，而是通过人类形成了群体，由群体的集体生活而产生了社会组织，才形成‘复合整体’的人文世界。另外，关于文化的历史性、关于社区和制度的区别、以及关于什么是田野工作者‘研究的适当单位’这些问题，还值得继续讨论。”

《晋商的理财文化》，载《读书》1995年第5期。文中道：“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开幕的学术研讨会上邀我发言，正好前一天参观了太原附近祁县的民俗博物馆，即有名的‘乔家大院’。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以这个大院为背景，把乔家大院拍成腐败的封建家院，而实际上乔家却是清末晋商勤俭理家的典范。因此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个至今尚没有脱掉农业地区小镇本色的小小祁县怎么会在二百多年前就产生了这么多的豪商巨贾，垄断全国金融业直到解放前夕？我用‘天地人’三才分析法来解剖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的兴起：一是正赶上十八世纪中叶，西方现代商业势力大举入侵，作为列强逐鹿的大市场，国内商业和金融业势必随着发展。从地缘优势来说山西与内蒙仅隔条黄河，正是农牧区的交接边缘，汉人占据了茶马交易的水旱码头（如包头）。至于人的素质，山西勤劳敢冒险的有经营才能的农民下口外，而且创业以后依靠亲属和乡土关系与人结伙合作，使事业大发展并形成晋商的集团。值得注意的是乔家不但有传统式的家规，还有一套理财和管理的哲学以及商业的伦理。这一套伦理是以我国小农经济为基础，或者可以说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结构上是以亲属和乡土关系为轴心，在内容上还是强调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厚道。总之，从晋商的理财文化来看，这些传统伦理基因还是发展出了可与西方现代管理方法相比的企业精神。这使我想起我的老友杨庆堃教授对Weber的批判（见*The Religion of China*译本前言）。在Weber看来，缺乏新教精神的东方国家不可能自发地发展现代的企业。我想，如果他能知道中国晋商的发家史，就不会贸然断言了。”

《再访震泽》，载《社会》1995年第8期。文中道：“再访震泽，今非昔比，实在令人欣喜。但目前的经济繁荣之中似乎隐藏着令人注意的潜忧：农业收入尽管稳中有长但潜力不大，耕地有限；乡镇

企业承受的压力似乎过重，既要支持地方财政，又要支农和维持农村社会福利，还要面对国际竞争。因此，我想提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农工之间杀出一条新路，即建立大农业，在农副业上做文章。镇江龙山鳊鱼养殖出口的经验启发我们要探索跨区域资源的合理搭配和优化组合，开辟新的副业项目。其次，我发现震泽经济发展相对迟缓，排名靠后，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震泽作为一个镇的功能发生了变化，震泽传统的商业服务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没有保住和发挥。30年代的航船业和乡脚表明了镇对周围农村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因此，是否可以把发展现代商业服务业作为振兴震泽，且配合以上所说的立足当地资源的副业项目的一条路子来看待呢？第三就是关于各级政府，包括像震泽这样的镇政府的职能在未来的工、农、副、商业的分工体系中如何转变的问题。这涉及的面更广，内容也更深刻，只能留待以后研究了。”

《言以助味》，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这是一本杂文选集，包括《乡情脉脉话酒肴》、《闻香已醉，未品先酣》、《龙胜猕猴桃》、《家乡的风尾菇》、《盐城的藕粉丸子》、《撒拉菜单》、《访日记记》、《秦淮风味小吃》、《肺腑之味》、《榕城佛跳墙》、《无棣金丝枣》、《副书记的十大营养蔬菜》和《话说乡味》。

